



抗战时期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浙江实践

曹兴平^a, 朱婉婷^b, 郑蓓蓓^b

(中国计量大学, a. 党委组织部;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周恩来对群众路线理论的丰富与实践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在浙江指导抗战工作的实践, 更是群众路线从早期认识发展为成熟思想得以运用的关键。这一时期的实践, 不仅标志着周恩来对群众路线思想认识的深化, 而且实现了这一思想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升华, 为其后续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系统考察抗战时期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在浙江的实践, 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 周恩来; 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浙江

中图分类号: K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6) 06-0315-07

Practice of Zhou Enlai's mass line thought in Zhejiang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AO Xingping^a, ZHU Wanting^b, ZHENG Beibei^b

(a.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ittee;

b.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mass line is the lifeline and fundamental working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ou Enlai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nrichment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line theory. Especially in the practice of guiding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Zhejiang, it is a key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line thought from early understanding to mature application. The practice of this period not only marked the deepening of Zhou Enla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line, but also realized the sublimation of this thought from epistemology to methodology,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subsequent mass work.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Zhou Enlai's mass line thought in Zheji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practice the mass line and always maintain flesh-and-blood ties with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Zhou Enlai; mass line;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ejiang

收稿日期: 2025-07-1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2024QN170); 浙江省“十四五”第二批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JGCG2024248);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454454)

作者简介: 曹兴平(1982—), 男, 山东临沂人, 副研究员, 硕士, 主要从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浙江,针对彼时浙江军事失利、政治分裂、经济衰败、文化教育面临危机的复杂局势,开展了抗战视察工作。他辗转金华、绍兴、杭州等县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成功将群众路线从理论原则转化为系统的实践方法。其中依靠群众力量的具体路径与实践体系构建,“两手工作”策略下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方法,有效激发了浙江人民的抗战热情,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了坚实基础。探究周恩来在浙江的群众路线实践,对研究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就目前关于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着重对该思想内涵进行阐释、对全国层面的实践展开考察以及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进行宏观梳理。张瑾^[1]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积极倡导并践行群众路线,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坚决抵制官僚主义,以此警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侯晋雄等^[2]认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并运用“永远不与群众隔离”这一重要法宝,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二,侧重于梳理周恩来在浙江开展统战工作与党建工作的相关史料。林威杰^[3]对1939年3月19日至4月6日周恩来在浙江绍兴、金华、丽水等地的视察与演讲情况进行了简要叙述。王祖强^[4]以时间为线索,详细梳理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浙江工作的具体细节,涵盖周恩来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对黄绍竑等国民党进步官员开展统战工作,以及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向浙江省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地方党组织建设等内容。当前学术界关于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成果,但针对浙江地域实践的系统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对其在浙江的实践细节、地方特征及实际成效的挖掘不够充分;同时,既有研究成果多为对周恩来在浙史事的梳理与史实的罗列,从群众路线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其领导与推动的浙江抗日文化运动、新闻出版事业、民众教育等社会动员实践的研究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结合《1939年周恩来的皖南浙江行》^[3]、《鞠躬尽瘁世人楷模:周恩来在浙江史事略述(一)》^[4]和《日军侵略浙江实录》^[5]等相关文献史料,对抗战时期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在浙江的实践展开与发展脉络进行探究,揭示浙江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对其“依靠群众力量”认知深化的促进作用,并梳理该思想在宣传动员、民众教育等领域的具体方法

与实践特征,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抗战时期浙江践行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自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至1940年1月22日日军进犯萧山,浙江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民政府军与日军隔钱塘江对峙之态势。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使浙江民众陷入生存危机与精神认同动摇的双重困境,亦使得践行群众路线、凝聚民众力量成为彼时浙江抗战的必然抉择。

(一)军事政治:战败阴霾与政治压榨下的民众信心丧失、组织涣散

一方面,杭嘉湖战役失利,导致浙西1市14县大面积沦陷,国民政府军损失惨重。《日军侵略浙江实录》收录的第十集团军平嘉之役战斗要报,详细记载了国民政府军与日军的战斗经过。“十三日,……右翼方面,敌三千余人向我虎啸桥、赵家桥、四里桥、广陈镇一带七九师阵地进犯,以广陈方面最为激烈,该处工事全被敌机炮炸毁。”“十四日,……我一二八师、一〇九师经数日苦战,所部伤亡奇重。本日拂晓起,敌进攻尤烈,集中机炮竟日轰炸,阵地全毁。”^[5]连续的军事失败,让民众对“抗战能否胜利”产生深切疑虑,抗战信心遭受重挫。

另一方面,为迅速掌控占领区域,日军实施怀柔控制与殖民统治,于1939年1月27日颁布《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规定》《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业务规定》等文件,并于2月1日成立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将其作为在浙江实施政治统治的核心机构。该机构成立后,迅速制定年度规划,通过构建并强化警察与情报机构、掌控公路通信网络、推行保甲制度开展户口清查、组建防共青年团等举措,妄图实现对占领区的长期控制。除遭受日军的直接统治外,浙江民众还遭受以汪瑞闳为首的伪浙江省政府的残酷迫害^[6]。此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治生态的分裂。在多重政治势力的挤压下,浙江民众既对当局政权失去信任,又难以自发形成强大的抗战力量,陷入组织松散的困境。在此背景下,重塑民众的抗战信心、凝聚分散的抗日力量,成为当时浙江抗战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二)社会经济:经济剥削与生存危机下的民力衰竭、动员基础薄弱

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对杭州民

众征收筵席捐、茶馆捐、游艺捐、店屋捐、住屋捐、旅店捐、人力车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5]619}。原本作为浙江粮食主产区的浙西嘉湖平原失陷后，沦为日军军粮供应地，日军对其进行严格封锁，致使浙东尤其是萧山、绍兴一带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缺问题。各地粮食价格暴涨，“天台贵至每元七升，平阳贵至每元十五市升……萧绍方面甚至一面有市无货，而一面有钱无米。”^[7]苛捐杂税的繁重与粮食资源的枯竭，不仅迅速耗尽民众的物力与财力，更削弱了其身体素质，严重打击了其抗战意志。在此情形下，脱离群众生存实际的抗战宣传毫无效力，群众工作必须与解决民众经济问题紧密结合，为政治动员筑牢坚实的物质保障，才能真正凝聚起民众抗战力量。

（三）文化教育：文化殖民与教育中断下的认同危机、思想阵地缺失

日军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煽动日本文化人组成“钢笔部队”，在浙江各战场大肆宣扬“战败国的悲哀”“人生下来便是为了战争”^[8]的错误思想，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民众的抗战意志。同时，日军通过篡改教材、推行日语教学等奴化教育手段，实施系统性的文化殖民战略。为躲避战火侵袭与奴化教育，浙江各地学校纷纷向未沦陷区迁徙。如省立台州中学的师生在日军侵袭海门关后，踏上长达500多里的迁徙之路，一路住破庙、睡硬地、喝山水^[9]。教育事业的全面中断，让广大浙江青年学生陷入思想失序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以金华—丽水为中心的抗日文化运动虽顽强推进，但影响力多集中于城市，对农村及边缘地区的辐射力有限。因此，群众工作必须牢牢占据文化教育阵地，通过强化民众的民族认同，将抗战精神内化为民众的坚定信念，为军事与经济斗争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综上所述，传统的命令式抗战动员模式在当时的浙江地区已全然失效。一方面，军事上的惨重失利使民众难以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各方政治势力的激烈角逐致使民众未能达成统一动员，民众力量无法凝聚成坚实的抗战合力；另一方面，经济衰败与生存压力极大削弱了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与战斗力，文化殖民则引发了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在此情形下，任何脱离群众的路线与政策均难以扭转浙江抗战的艰难局势。唯有践行深入群众、激发群众主体性的群众路线，方可凝聚全民抗战的强大力量，激励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直至胜利。而周恩来此时前往浙江指导抗战工作，正是顺应了这一亟须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的关键时局。

二、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浙江实践路径与体系确立

面对浙江民众的抗战信心危机和民众动员的艰难困境，周恩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广泛开展抗战动员的工作中，完成了从“相信群众力量”这一重要理念的具体运用，到“如何依靠群众力量”的方法探索，最终确立了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的实践体系，实现了群众路线思想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升华。

（一）认知升华：从相信群众力量到凝聚抗战民众力量

周恩来对于群众力量的认识由来已久，其在浙江指导抗战的实践，推动了这一认知实现从信念确立到具体运用的飞跃。学生时代，他在《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中提出“群策群力，不崇朝可致巨款”^{[10]56}的主张，此时对群众力量的认知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国民革命时期，他深刻认识到工农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坚定性和革命性，指出“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11]2}，明确了群众力量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回答了“谁领导”这一核心问题。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正式提出“相信群众力量”，将其上升为党的工作理念，并严厉批判红军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指出“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作两样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11]37}。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浙江面对民众抗战信心低迷的局面，坚持“相信群众力量”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提出“人民爱护军队，军队保护人民，军民一家，胜似鱼水，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2]53}，将抽象的“群众力量”具体化为政党与军队之外一切可团结的人民抗战力量。这一认知深化与实践运用，为其在浙江开展群众工作确立了清晰的认知前提：群众工作以作为历史主体、兼具现实利益与诉求的人民群众为对象，其力量体现在社会各层面；开展群众工作必须明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应当依靠的具体群众力量。

（二）路径探索：发扬民主作风与组建群众武装相结合

在明确要依靠的具体力量的基础上，周恩来重点解决了“如何依靠群众抗战力量”的方法问题，形

成了发扬民主作风与组建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实践路径,推动群众抗战力量从潜在形态变为现实力量。

第一,发扬民主作风,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1939年3月31日,周恩来在诸暨县枫桥大庙的欢迎大会上强调:“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广土众民,潜力无穷,但要把潜在的力量化为现实的力量,还要发扬民主,让群众自己当家做主,挑起抗日救国的担子。”^[13]同年3月28日凌晨抵达绍兴后,他与兼任绍兴三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交谈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不能再把人民看作刘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14]¹⁷⁷周恩来在浙东地区提出“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给人民以民主”等主张,直接指导并深刻影响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1945年1月,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浙东区党委在发扬民主作风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区以下乡保长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当选的乡保长既有党员,也有非党员人士。这一实践让根据地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有效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挖掘地方抗争精神,发展民兵武装组织。早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的广播讲话中,周恩来就萌生了建立民兵组织的想法,提出“充分保障人民权利给广大民众以武装的组织和训练”^[15]。抵达浙江后,他深刻感受到浙江人民血脉中的民族意识与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16]。周恩来在浙中开学典礼中提到“我们浙江这种传统的民族思想,使我们浙人在这次抗战中表现得特别英勇,特别热烈”^[17],并认为这正是浙江作为东南战场前线,仍能在各方面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在诸暨视察期间,周恩来深入了解民情后作出判断:“诸暨人民是有革命性的,一旦日寇入城,他们是不会屈服的,只要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一定会干得很出色。”^[12]¹⁷¹他强调,要将诸暨人民的革命精神作为党开展民兵组织工作的情感纽带,充分动员和组织群众,发挥其战斗力量。为进一步凝聚浙东人民的抗战力量,1944年1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民兵自卫队简章》。随着《民兵自卫队简章》的贯彻落实,截至1945年上半年,诸暨北区建立了枫桥、江藻、湮浦三个区自卫队和16个乡镇自卫队,吸纳民兵5000余人,成为继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之后的第三支有生力量,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人民战争的目标。

浙东地区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与群众自卫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在战时浙江的生动实践。这一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真正赋予并保

障人民民主权利,为群众的抗争精神提供组织基础,才能激发出最磅礴、最持久的抗战力量。

(三)体系确立: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的实践机制

“依靠群众力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维护群众利益。周恩来在浙江指导抗战的工作过程中,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的实践体系,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让群众路线真正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第一,保障群众知情权,凝聚抗战思想共识。周恩来在浙江期间,通过多场公开演说,系统揭露日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的新阴谋,详细介绍国家“军事上游击队与正规军配合,加以打击,政治上采取攻势,经济上加强封锁,文化上尽力推行游击区教育”^[14]²²⁷的抗战政策。同时,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界群众分析浙江的抗战形势,帮助民众“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17],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共同意志,让民众“看不到希望”的悲观情绪转变为“相信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引导群众正确参与抗战,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利益。

第二,完善调查研究方法,精准掌握真实民情。周恩来将调查研究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在浙江期间系统提出以“询问、倾听、解释”为核心的调研原则,力求全面、深入地掌握民情民意。在指导军区队员开展民众军事训练时,他明确要求“到各区去,经常地去检查”^[18],并强调应“利用检查的机会,分别和他们谈话”^[18],通过实地调查了解训练实况、民众反馈及存在问题。这一调研过程,不仅注重信息的收集,更重视与群众的双向沟通与思想引导。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当民众“提出许多问题来问”^[18]时,工作人员必须“替他说明白,解释他所要解释的问题”^[18],达到“使他在政治上有所了解,使落后的壮丁和前进的壮丁,统统明白抗战的道理”^[18]的效果。这种以“询问”发现问题、以“倾听”获取实情、以“解释”统一认识的方法体系,不仅提升了军事训练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更推动了群众对党的抗战政策的理解与认同,最终将军事训练转化为民众的自觉武装行动,动员群众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战,从而筑牢了抗战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浙江的实践推动其群众路线思想实现重要发展。认知层面,深化了对群众力量的具体理解,聚焦抗战语境下的民众抗战力量;路径层面,探索出发扬民主、组建民兵武装以动员组织群众的有效路径;实践层面,构建起以维

护群众利益为核心、以保障群众知情权与深入调研为支撑的完整工作体系。这三个层面凸显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坚守群众立场,系统回答了“依靠什么”“如何依靠”“依靠为了什么”的根本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路线在抗战中的政治凝聚力与军事支撑力,标志着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从理论建构转向实践深化,为其思想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引领下 浙江抗日宣传教育的方法与策略

面对日军的文化殖民,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教育领域的抗战斗争,将其视为抗战的“第二战场”。1939年4月5日,周恩来在金华中国旅行社分社会见骆耕漠、邵荃麟、葛琴等浙江文化工作者时,明确指出开展群众工作“要学会两手工作的策略”^{[19]64},即一手抓文化宣传工作,一手抓群众工作,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宣传方法。在教育方面,他同样将教育工作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涵盖耐心说服、实效导向、模范作用的系统性教育方法,有效破解了战时浙江文教工作的现实困境。

(一) 因时因地制宜:推动抗日宣传与群众工作深度融合

周恩来在指导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就曾提出“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11]36}探索拓展宣传影响的路径。在浙江期间,他结合浙江敌我对峙的特殊环境,进一步提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20]的宣传方法,为浙江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提供了有益指导。

一方面,周恩来主张运用多样化的宣传技巧进行秘密宣传,以文化进攻破解敌伪反动宣传。周恩来提出,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20],并指出在浙江“因为环境关系不能公开地作普遍宣传,但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运用各种宣传的技巧去进行”,他特别指示可以运用“弹词、说书”^[20]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抵达金华当晚,就特别会见了刘良模率领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即“第十支部”)和吴大琨、杨帆率领的上海地方协会第三战区慰问团的青年们,鼓励他们说:“军人服务部和歌咏队是一项重要工作,组织群众学习抗战歌曲,让歌声来激励人民的反日情绪,很受广大群众欢迎。你们要努力克服艰难险阻,好好地干!”^{[19]61}通过歌曲等文艺形式向浙江民众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成

为宣传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典范。

另一方面,要以了解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让宣传工作扎根群众。在金华会见文化工作者时,周恩来作了具体指示:“无论办报办刊物,都要十分重视加强和读者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吸引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14]7}这一指示体现了党的宣传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方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浙江各地抗日宣传团体和文化人士积极行动,从民众思想情绪出发创作作品,如《浙江潮》发布的诗歌《五月》:“农夫的炙黑的脸上,早已消失了往年的笑容。愤怒地、咬紧牙齿,忍受着生活的苦痛……三千万奴隶,在敌人残酷的铁蹄下,开始粉碎那耻辱的桎梏。”^[21]真实的情感表达与鲜明的抗日立场,引发了群众的强烈共鸣。

(二) 坚持说服引领与实效导向:促进抗日教育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就深刻认识到启发民智的重要性,指出:“虽百余年后,恐亦将如今之唯唯否否,惟力是趋之民类耳!”^{[10]66}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22],充分彰显了教育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抗战期间,为有效动员和教育群众投身抗战,周恩来对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形成了系统性的教育方法。

第一,坚持耐心说服,摒弃强迫命令。在群众军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中,周恩来强调,要根据群众的出身、职业和生活习惯开展针对性教育,“需要耐心地说服他”^[18],避免强迫命令,确保在“国家需要兵员补充的时候”^[18],群众能自愿投身抗战。

第二,立足实效导向,拒绝形式主义。周恩来明确指出,教育工作要“要重实际,不要重形式”,“实际重于形式,这样才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才有用处”^[18],并且教育内容应该求精,不求多。这一主张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确保教育内容能够真正被群众理解、掌握并运用,让教育工作真正服务于抗战动员。

第三,发挥模范作用,坚持言传身教。周恩来强调,教育工作者的言行直接影响教育效果,若“衣食住行,都不能做一件模范,那么老百姓就会轻视我们,觉得我们训练他不过是骗骗他”^[18]。他进一步提出,要“拿事实来做模范给他看,再教他,他才会注意”^[18],要求教育工作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一注重自我修养、强调言传身教的思想,在周恩来后来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深化,体现了

其群众路线思想的一贯性与发展性。

综上所述,周恩来针对宣传与教育工作所作出的一系列指示,不仅切实破解了抗战时期浙江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巩固了反抗日伪的思想文化阵地,更意味着其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实现了系统化发展,构建起将宣传动员与教育渗透相融合的综合群众工作方法体系,为抗战时期浙江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抗战时期周恩来浙江群众路线实践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浙江践行并发展群众路线,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深入基层动员广大群众、凝聚抗战力量,形成了契合浙江抗战实际的群众工作方法。在此过程中,既为巩固后方、推动全民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也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体系。立足新时代,从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可供当代借鉴的实践路径,对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在浙江的实践,对于争取抗战胜利、丰富与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该实践有效促进了浙江各界群众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汇聚了强大力量。在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引领下,浙江各地抗敌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在农村地区,各地陆续组建农会,有序推进减租减息工作,逐步构建生产互助模式,农民积极加入民兵自卫队;在城市,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工人的抗日救国热情得到充分激发,浙江全民抗战的格局渐趋形成。另一方面,这一实践为浙江抗战的战略反攻积蓄了坚实的群众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根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有力保障了浙东、浙西、浙南等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巩固。

周恩来在浙江开展的群众工作实践,进一步充实并拓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体系,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层面,周恩来始终坚持尊重与依靠人民群众,深刻阐明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与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这一主张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时代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阶段及长期执政进程中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

泉。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层面,他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足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周恩来准确把握群众诉求的时代内涵,坚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党的工作根本遵循,并以畅通群众知情渠道、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等务实举措回应民众期待。这些探索深化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护人民利益的理论内涵,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在工作路径层面,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两手工作”策略,将群众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紧密结合,展现出成熟的治理能力与领导艺术。通过改进宣传教育形式,有效提高群众的政治认知与斗争决心,彰显出党在复杂局势下灵活施策、广泛汇聚力量的执政优势。此外,周恩来在浙江躬身实干、走近基层、贴近民众的实际行动,进一步丰富了党的优良传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对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当代启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的关键阶段。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浙江的群众路线实践,历经复杂严峻斗争环境的淬炼,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群众路线不仅是党在艰苦卓绝岁月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更是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巩固执政根基、赢得发展主动的根本工作路线。

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路线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站稳人民立场。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要传承周恩来在浙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和“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精准发力,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必须坚持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大兴调查研究,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诉求,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借鉴周恩来在浙“询问、倾听、解释”的调研方法,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听真话、察实情、解难题,让决策更贴合基层实际、更顺应群众心愿。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健全民主制度、畅通民意渠

道、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传承“两手工作”策略,将宣传教育与群众工作深度融合,用好新媒体、新载体、新形式,以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党的理论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群众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还需强化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与模范引领。以周恩来在浙言传身教、躬身实干为标杆,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在服务群众中作示范、当表率,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面对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任务,更要依托群众路线凝聚全民合力,把群众的智慧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把群众的力量汇聚成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唯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才能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让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五、结 语

抗战时期,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的浙江实践,是其思想从抽象理论认识向具体实践方法演进的关键节点,构建了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有机融合组织动员、宣传教育与调查研究的系统化工作体系。认知层面,他将抽象的“群众力量”具体化为可凝聚的组织力量,明确了依靠对象;方法层面,以发扬民主、精准宣传与实效教育,形成“组织—宣传—教育”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价值层面,通过保障知情权与深入调研,实现了“依靠群众”与“服务群众”的高度统一。这一实践不仅奠定了周恩来后续群众工作的方法论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群众工作的重要范本,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早期研究,在实践上为新时代密切党群联系提供了直接历史借鉴。诚然,受限于档案资料,本研究在量化史料方面,缺乏对周恩来于浙江开展群众工作的具体活动细节及成效的有力佐证;研究主要聚焦于1939年周恩来在浙江的视察实践,对于后续浙江抗日根据地如何继承与发展相关经验的探讨尚显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相关档案资料与口述史料,适度拓展研究时段,梳理周恩来群众路线思想

在根据地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同时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与党群关系建设,提炼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推动研究朝着区域化、精细化、跨学科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方向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谨.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党的三大作风的倡导与践行[J]. 党的文献, 2021(5): 66-72.
- [2] 侯晋雄, 顾霞凤.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工作的思考与贡献[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6, 30(1): 100-105.
- [3] 林威杰. 1939年周恩来的皖南浙江行[J]. 党的文献, 2019(1): 61-67.
- [4] 王祖强. 鞠躬尽瘁世人楷模: 周恩来在浙江史事略述(一)[J]. 浙江档案, 2016(2): 24-29.
- [5] 浙江省档案馆,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日军侵略浙江实录[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6] 省公署下月正式成立[N]. 新浙江日报, 1938-05-31(1).
- [7] 徐日琨. 抗战期间浙江之粮食问题[J]. 浙江建设战时特刊, 1939(1): 15-25.
- [8] 温依夫. 浙西敌伪奴化教育全貌[J]. 浙江战时教育文化, 1939, 1(7): 25-29.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17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南开大学. 周恩来早期文集: 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 [11]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2] 金延锋. 故园情深: 周恩来与浙江纪实[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李永鑫. 绍兴通史: 第五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358.
- [14]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周恩来抗日前哨行[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5] 周恩来. 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N]. 新华日报, 1938-04-17(1).
- [16] 周恩来. 桐庐为战时前进县[N]. 桐庐报, 1939-04-01(4).
- [17] 临安区档案馆. 周副部长在浙中开学典礼演词: 1939年3月24日[EB/OL]. (2021-06-07) [2026-04-13]. https://zjnews.zjol.com.cn/ztj/gjdar2021/bnbd/202106/t20210607_22639375.shtml.
- [18] 周恩来. 建军的重要性与社会军事化的实施: 四月三日军委政治部周副部长在干部教导总队讲由周健君速记[J]. 浙江潮, 1939(85): 152-153.
- [19] 邵济安, 王存诚. 邵荃麟百年纪念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文化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2.
- [21] 乾虹. 五月[J]. 浙江潮, 1939(60): 197.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34.